

# 中国两类土改小说的比较研究

张全之 刘媛媛

**摘要:**20世纪四五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土改小说有着明显不同:前者以政治和政策为主导,记述历史进程,而对历史进程中被挤压的个体的命运,则缺乏必要的关注,作品成为政治运动的次声部,因而这类作品对暴力和土改干部的描写较为单一。后者以史料和文献档案为基础,能够冷静地谛听、考辨与重建历史,具有很强的私人性和个体性。他们在描写暴力事件时,将暴力与人性纠结在一起,更好地彰显了历史事件的多重意蕴。他们对“冷酷型”、“反思型”和“悲情型”土改干部形象的塑造,呈现了历史进步途中个体命运的复杂性。四五十年代土改小说存在的种种问题,除了受当时政治形势的规约外,与二三十年代以来左翼文学形成的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有着密切关系。

**关键词:**土改小说;土改干部;左翼文学;暴力;人性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土改小说创作的繁荣主要出现在两个时期:一是四五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在四五十年代,中共在解放区全面推行土改,催生了一大批土改小说,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周立波的《暴风骤雨》(1948)等。这些作品都是作家在反复研读和领会党的土改政策和相关文件的基础上创作的,所以我们将这类作品称之为“政治运动史”。到八九十年代,随着“文革”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文学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一批涉及土改这类历史题材的作品又开始涌现,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1986)、张炜的《古船》(1986)、乔良的《灵旗》(1986)、尤凤伟的《诺言》(1988)、《合欢》(1993)等。进入21世纪之后,也仍有少量作品触及这一陈年往事,如尤凤伟的《小灯》<sup>①</sup>(2003年)、阎欣宁的《以死者的名义》(2006年)等。八九十年代作家在重新审视土改这一历史事件时,获得了鲜明的自我身份和个人立场。他们虽然没有亲历过那一幕历史的壮剧,但他们在阅读有关史料的基础上重构历史,唤醒了在沧桑巨变中被正史遗忘的生活细节和心灵风暴,将这一政治事件演绎成了一幕幕“私人生命史”。这两类土改小说不同的创作旨趣,导致了两类作品在内涵和风格上的巨大差异,因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值得认真剖析。

## 一、暴力与人性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带有普遍的暴力倾向。被阶级斗争理论武装起来的农民,对他们所认定的阶级敌人采取了残酷的报复行动,种种匪夷所思的手段,让人心惊肉跳。当时在河南领导土地改革的赵紫阳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如今,政权在我们手里,真理在我们手里,群众站在我们一边,我们手里还有枪杆子、笔杆子。土改完全可以有序地进行。为什么一定要搞得天翻地覆?为什么一定要搞得血淋淋的?”<sup>②</sup>作为土改初期的指导性文件,《五四指示》的态度还是很温和的,主张

作者简介:张全之,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重庆 400047);刘媛媛,山东省临淄中学教师(山东临淄 255400)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的前期成果(项目编号:NECT-10-0996)。

① 尤凤伟写过多篇土改小说,后来他将这些作品汇集起来,以《1948》为题,分“金”、“木”、“水”、“火”、“土”五个部分,发表于《西部》2008年第8期,本文均根据此版本。

② 程云:《关于土地改革的回忆》,《武汉文史资料》2005年第4期。

保护中农和富农的利益;在强调对汉奸、豪绅、恶霸作坚决斗争的同时,还提出“仍应给他们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须的土地,即给他们饭吃”<sup>①</sup>。在1946年底,中共高层还一度酝酿发行土地公债赎买地主土地,这说明土改初期,有关领导人并没有采取激进措施的计划。但到1947年,随着国共两党战争的升级,中共高层开始调整土改思路。毛泽东提出,土地问题要尽快解决,办法是“用群众运动来与地主决裂,来得到土地”。在此基础上,康生对土改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不但要从经济上把他(指地主——引者注)打垮,而且要从政治上打垮他”,并鼓励农民采用打耳光、跪瓦渣、浇毛粪、剥衣服等暴力手段,把地主的气焰彻底打下去。其实到土改的时候,大部分地主尤其是小地主,早已是惊弓之鸟,噤若寒蝉,哪里还有“嚣张气焰”?而当时领导土改工作的刘少奇,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百分之九十以上群众的意见就是法律,就是政策”,“太行经验证明,消灭地主一定要彻底,他们叫做扫地出门,土地财产长期性搞干净,让他们要饭七天,挑粪三担。”“一定把地主打跨了,然后恩赐他一份,他才会感恩。”在此基础上,要求土改干部走群众路线:“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分浮财,挖底财,分土地,把地主扫地出门。”<sup>②</sup>这些激进观点,尤其是所谓的“贫雇农路线”,“查三代,查历史”的做法,使大量的中农、贫农和手工业者被划为地主或“下坡地主”,受到强烈冲击。无论什么人,一旦被划为地主,就必然受到残酷的拷问,有的甚至毙命。尽管后来中共意识到左倾错误的泛滥予以纠正,但到1950年代土改时,这种状况依然存在。如1950年,“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sup>③</sup>。除上述办法外,还有坐老虎凳、蹲水缸、浇冷水、爬、变狗叫、在头上压石头、吊半边猪、人工分尸等等<sup>④</sup>。农民对地主的暴力行为,引发了地主武装的疯狂报复,尤其是“还乡团”对土改干部及其家属的血腥屠杀<sup>⑤</sup>,令人不寒而栗。一场旨在变革中国经济形式的政治运动,导致了类似江湖仇杀一般的冤冤相报。

那么当文学反映土改的时候,作家如何处理这些暴力事件?他们的作品赋予了这些事件怎样的意义?当我们把四五十年代和新时期两类土改小说并置阅读的时候就发现,它们都写到了暴力土改问题,但思想立场与情感倾向明显不同。

四五十年代的作家对暴力土改现象的描写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暴力事件有意淡化,强调土改运动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可喜变化。如孙犁的《秋千》、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等。但在作家不经意的地方,还是透露出了一些信息。如《秋千》中讨论大绢家是不是富农的问题,就看出“查三代”的影子;小说结尾一句“只有剥削过人的家庭,不得欢乐”,就暗示了地主受到镇压的事实。二是正面描写暴力事件,并赋予它顺应历史、顺应民心的历史进步意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在暴力事件发生之前,极力描写地主的丑恶嘴脸和对农民的残酷迫害,这为后面农民的暴力行为(报仇)提供了充分的铺垫。如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开篇细致罗列村里有钱人的种种恶行,通过这层层铺垫,民众对地主的仇恨被渲染到极致,所以当共产党来了之后,作为恶霸地主代表的李如珍就必然成为报仇的对象,小说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大家喊:‘拖下来!’说着一轰上去把李如珍拖下当院里来。……听有人说:‘拉住那条腿’,有的说‘脚蹬住胸口’。县长、铁锁、冷元,都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说着挤到当院里拦住众人,看了看地上已经把李如珍一条胳膊连衣服袖子撕下来,把脸扭得朝了脊

① 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页。

② 以上相关史料,引自杨奎松:《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见《开卷有益: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8—316页。

③ 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问题》,《史林》2008年第6期。

④ 有关此类情况的描述,可参见张成洁:《苏南土地改革时期斗、打逼缴现象的历史考察》,《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⑤ “还乡团”对农会干部的疯狂报复,在张伟《古船》和尤凤伟《1948》中均有详细描述。

背后,腿虽没有撕掉,裤裆子已撕破了。”<sup>①</sup>作恶多端的旧村长李如珍就这样被愤怒的群众撕成了碎片,一场崇高的革命在民间变成了泄私愤的复仇行动。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对暴力事件的描写,与赵树理的思路是一致的。他对地主韩老六的罪恶进行了事无巨细的交代:他霸占公井,非法占地,欺辱良家妇女,乱摊劳工,卖国通敌,总之是“好事找不到他,坏事少不了他”,“仗着日本鬼子帮忙,家业一天天兴旺……‘不杀穷人不富’,是他的主意。他的手沾满了佃户劳金的红血。”<sup>②</sup>毫无疑问,土改开始后,作为罪恶的化身,韩老六就成为民众报复的对象:

“揍死他!”

从四面八方,角角落落,喊声像春天打雷似地轰轰地响。大家都举起手里的大枪和棒子,人们潮水似地往前边直涌,自卫队横着扎枪去挡,也挡不住。……

无数的棒子举起来,像树林子似的。……

韩老六的秃鬓角才从地上抬起来,一个穿一件千补万衲的蓝布大衫的中年妇女,走到韩老六跟前。她举起棒子说:

“你,你杀了我的儿子!”

榆木棒子落在韩老六的肩膀上,待要再打,她的手没有力量了。她撂下棒子,扑到韩老六的身上,用牙齿去咬他的肩膀和胳膊,她不知道用什么法子才解恨。<sup>③</sup>

因为有了前面的铺垫,所以这种血淋淋的复仇行为就具有了正当性,成为大快人心的事,表征着历史的一次巨大进步。另外一部著名的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暴行的描写也如出一辙。小说从开始就暗示,在暖水屯最具民愤、民众最想斗争的人是钱文贵。但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他都凭借自己的精明顺利过关,这使很多人感到失望。小说接下来描写钱文贵的奸猾和邪恶:他让儿子参军,以获得抗属的身份,支持黑妮与农会主任程仁的爱情,希望获得保护。但最后他终于没有逃脱应有的惩罚:

人们都涌了上来,一阵乱吼:“打死他!”“打死偿命!”

一伙人都冲着他打来,也不知是谁先动的手,有一个人打了,其余的便都往上抢,后面的人群够不着,便大声嚷:“拖下来!拖下来!大家打!”

人们只有一个感情——报复!他们要报仇!他们要泄恨,从祖宗起就被压迫的苦痛,这几千年来的深仇大恨,他们把所有的冤苦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他们恨不能吃了他。<sup>④</sup>

被阶级意识唤醒并不断积聚的仇恨终于获得了总爆发。钱文贵在张裕民的保护下,才幸免了被撕碎的命运,但经过群众的集体殴打,他彻底屈服了。作者以得意的笔调描写了他被打后的形象:“这时钱文贵又爬起来了,跪在地下给大家磕头,右眼被打肿了,眼显得更小,嘴唇破了,血又沾上许多泥,两撇胡子稀脏的下垂着,简直不像个样子。”<sup>⑤</sup>

这些暴力场景的描写,既反映了土改的真实状况,也反映了作家们对待暴力事件的基本态度。小说与现实毕竟不同,它需要一条内在的逻辑,给这些暴力事件注入思想或政治的内涵,并赋予它以意义。这条内在的逻辑就是民间伦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民众解决恩怨情仇的方式,除了通过官府寻求公道之外,还通行着“欠债还钱”、“欠命偿命”的世俗伦理。这些小说正是借鉴这一伦理规则,赋予暴力行为以合法性的。但这些世俗伦理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寻求公平的一种权宜之计,并非是寻求正义与公平的正当途径,更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真正目的。遗憾的是,这些作品无意中以民间伦理取代了革命真理,丝毫也没有意识到“民间伦理”与“革命真理”之间的对抗,这是作家的局

① 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文集》第1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第185页。

② 周立波:《暴风骤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66-67页。

③ 周立波:《暴风骤雨》,第177-179页。

④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0页。

⑤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选集》第1卷,第302页。

限,也是当时现实的局限。因为对这些放弃了自我批判意识的作家来说,让他们超越现实进行观察和思考,是不可能的。一旦暴力取得了合法性,那么它的意义就凸显出来,它就被看作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力量。

与现实中发生的形式多样的暴力事件相比,这些作品只选取了群体殴打这一简单的形式——也可能是最“干净”的形式。这既是为了服务政策,掩饰土改中的种种偏向,也是为了建立一个单一的语义系统:以一个暴力事件为中心,形成一个象征结构:地主的身躯,不再只是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物质存在,而是承载着一个阶级和一种统治形式积累下来的所有罪恶,所以对地主肉体的惩罚,就是对数千年来不平等社会制度的一次总结算;把拳头伸向地主的民众,已经不再代表他本人,而是代表数千年来所有的被压迫者。同样,指向人肉身的暴力,也不再血腥、残忍,而成为嘉年华式的狂欢。正是在这场狂欢中,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临盆,淋漓的鲜血和撕裂的肉体,是它临盆时必不可少的点缀。基于这样一个象征系统,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成为象征性符码。操控这些符码进行活动的,是这一寓言系统背后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和与之伴随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其实是用历史来遮蔽现实,用社会进步的宏大话语遮蔽了个体的生命苦难。作为个体的人,无论是打人的民众,还是被打的地主,都成为历史规律的替身,苦难与怨恨,成为历史进步的重要推力。唐小兵将这种写作方式称为“实质上否定了写作行为本身的写作方式”<sup>①</sup>,这只是针对文学而言,如果换一种说法可能更为准确:这是一种否定了人本身的写作方式。

但如果认为作家们在描写暴力事件时无所顾忌,那也是不确凿的。在具体描写中,我们也看到他们在呈现这些暴力事件时态度上的犹豫与暧昧。赵树理在写群众要求处死李如珍时,一再强调县长的有意推诿和延宕,就委婉地表达了对暴力事件的保留态度;丁玲在小说前半部分写斗争地主侯殿魁等人时,也有意删除了有关暴力的情节,只是简略提到,无数人的拳头,打向了躺在床上的侯殿魁,其血腥程度只能靠读者去想象。《暴风骤雨》中的暴力场景也得到了有意遮掩。这都说明作家们在暴力问题上态度是复杂的,这与当时的土改政策有关。其实当时中共高层人员对待暴力问题,也缺乏及时的和明确的态度,直到暴力事件愈演愈烈,死人事件频繁发生之后,才出面强力制止。高层领导者对待暴力问题上的不明确态度,使作家们的创作陷入两难,既不便过于露骨地加以歌颂,也无法明确地表示反对,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给暴力事件提供合理的解释。由此看出,四五十年代作家在对待暴力土改问题上完全是跟着政策走,跟着领导的态度走,缺乏自己鲜明的立场。所有的描写,都是以政治为中心展开的,他们在努力地与政治保持一致,这使他们的作品成为政治运动的次声部,是“政治化的文学”而不是“人的文学”。

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人的文学”思潮的回归,作家们获得了自我,学会了从自我的立场审视历史,那些看似颠扑不破的结论受到了质疑,一种新的土改叙事在中国文坛上蔓延开来,为我们提供了进入历史的另一个通道。尤凤伟解释说:“土改时我还是个孩童,一切都没有记忆。对土改的初始认识来自后来读到的一些写土改的作品,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坦白地说:我对那类经典是持怀疑态度的,也不必细加言说,时光已经使许多方面的事情不言自明。”<sup>②</sup>“不言自明”的是什么?是小说中贯注的那种令人不安的乐观精神,是建立在政策和意识形态之上的情节模式,是作家自我贬抑之后仰视政治运动的惶恐眼神,是被宏大叙事有意掩饰的种种真相。周立波明确说:“作家不能有个人主义思想,不能把文学当作个人的事业。如果这样,苦恼就多了。”<sup>③</sup>“苦恼”正是文学的酵母,没有苦恼的作家,也只能去演绎被设定的历史规律了。而新

① 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

② 尤凤伟:《我心目中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

③ 未央:《我们的楷模——悼念周立波同志》,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4页。

一代作家在这一点上实现了突破:他们虽然远离了那段历史,但那些档案材料以一种静默的方式,呈现出了历史事件的种种细节,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文学想象。尤其是那些暴力事件,更是震撼着他们的灵魂,逼使他们思索。于是我们看到,在他们笔下,一桩桩暴力事件除表征着历史进步之外,还获得了丰富的人性内涵。历史的另一幅面目,携风带雨涌向人们眼前,让人无法沉默。

张炜的《古船》以文学式的悲情和哲学式的睿智,照亮了那段被意识形态话语遮蔽着的幽暗的历史隧道。洼狸镇,这个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承载了那段沉重的往事。土改开始了,赵多多,这个为人唾弃、桀傲不驯、毫无廉耻、心狠手辣的混混,成为土改中的红人。从出身和品行来看,赵多多和丁玲笔下的张裕民有些相似,都自幼父母双亡,沾染了一身的恶习。如张裕民酗酒,到寡妇白银家里赌钱,“曾有一个短时期染了流氓习气”。但丁玲是把张裕民作为优秀土改干部来塑造的,所以他身上的恶习在入党之后,就完全改掉了。张炜则与丁玲不同,他如刀锋一般的笔触,剖开了赵多多身上的恶痛肿瘤,尽显其肮脏和污秽。赵多多由于自幼贫苦受尽歧视,所以对有钱人心怀怨恨。土改开始之后,他成为惩罚地主的积极分子,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心悸:

当夜,赵多多和几个民兵把平时最不顺眼的几个家伙脱光了衣服,放在一个土堆上冻了半夜。几个人瑟瑟抖着,赵多多说:“想烤火了?”几个人跪着哀求:“赵团长,开恩点火吧……”赵多多嘻嘻笑着,用香烟头触一下他们的下部,高声喊一句:“火来了!”几个人双手护着身子,尖叫着……这一夜轻松愉快。<sup>①</sup>

这已不只是残忍,还体现了他下流的变态心理。不仅如此,他还强奸地主家的女人,甚至连平常人家的女人也不放过。同样的人物也出现在尤凤伟笔下。《1948》中的民兵队长李恩宽心狠手辣,在批斗大会上,他将地主赵祖辉劈头一棍子砸死,对待其他地主也从不手软。他不仅乐于从肉体上消灭地主,还贪财好色,私藏地主家的财物,奸淫地主家的女人。他自己说:“咱老宽没别的喜好,就是喜好个娘们儿。”<sup>②</sup>当他搬进地主李裕川家之后,“把一个从外村来探亲的地主闺女带到后院强奸了,后来又和另一个民兵把这个闺女带到另一个空院里轮奸了。”他由于觊觎地主吕良福的漂亮老婆,所以在斗争吕良福的时候,他一门心思想割掉吕的“鸡巴”。他试图诱奸地主李裕川的女儿,因为没有成功就诬陷她拉拢腐蚀干部。而在斗争会上他对李金鞭的殴打,更让人触目惊心。李金鞭被押上审判台后拒不承认还有私藏的财产,群众愤怒地喊着口号——他们都希望挖出底财,自己可以分得一份。李恩宽走上前去解李金鞭的棉袄扣子,李金鞭哀求不要脱掉他的棉袄,“他的反抗激起李恩宽的愤怒,照准他敞开的前胸打了一拳。这时李金鞭的老婆‘哇’地大哭起来,朝李恩宽跪下了,叫着:‘恩宽兄弟行行好,饶了俺吧,饶了俺吧……’王留花离开座位向她走去,伸手撕她的嘴,血淌了出来,不住地往地上滴。她憋住了哭,但依然跪着。……这时李恩宽抡起棒子朝他打去。头一棒打在肩膀上,只听‘咔嚓’一声,会场上所有人都听见骨头的断裂声。李金鞭应声倒地,杀猪似地嚎叫着,满地打滚。李恩宽仍一棒一棒地打下去”<sup>③</sup>。暴虐的行径让土改工作组组长易远方都震惊了:从未见过如此不管死活打人的。在这篇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个和李恩宽很相似的女性形象王留花——她自幼命苦,敌视富人。惩罚地主的时候,她最喜欢的方式是用针扎。在斗争地主的女儿李朵的时候,她要扎李朵的“骚膀子”,被李朵打了耳光。她认为这是敌人嚣张,无法理解李朵的反抗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革命赋予了革命者惩罚敌人的权力,但这种惩罚如果没有了底线,人性的灾难就开始了。

类似这样的暴行描写,在《白鹿原》、《丰乳肥臀》、《故乡天下黄花》等作品中屡屡出现。赵多多、李恩宽、王留花,还有《故乡天下黄花》中的赵刺猬、赖和尚等,这类土改积极分子的形象绵延不绝,他们共同构成了革命年代的流氓无产者形象系列。我们不怀疑丁玲对张裕民的塑造基于她对现实的

① 张炜:《古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60页。

② 尤凤伟:《1948》,《西部》2008年第8期。

③ 尤凤伟:《1948》,《西部》2008年第8期。

观察,但像张炜、尤凤伟、刘震云等人的描写也不是空穴来风。根据美国人韩丁的记述,在张庄土改过程中,民兵队长王满喜就与上述人物十分相似。他斗争地主最为积极,但当斗争完地主之后,“王满喜很容易地从地主阶级的灾星变为普通人的灾星。他很快就养成了从前那些村痞的许多恶习”<sup>①</sup>。如果说,丁玲们提供了土改时的真实故事,那么张炜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真实——一种长期以来被遮蔽的真实。只有将这两种真实放在一起,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那段历史,才能看到历史的两幅面孔。

两代作家对土改中暴力事件的不同书写,反映了两代人在文学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丁玲那一代作家,认真贯彻党的土改政策,将文学看作是政治的延伸。所以在土改中被殴打的地主,从来没有被当作人来对待,他们在被殴打(或撕碎)中基本上是沉默的,像一件物品,成了历史罪恶的替身,被时代进步的车轮轻快地碾压过去;而打人者代表着正义与进步,在别人的肉体灾难中体验着新生(解放)的快乐。新时期作家则摆脱了当时的政治场域,从政治运动的缝隙中看到了个体的命运。被殴打者不再是代表统治阶级或剥削制度的政治符号,而是有知觉、有意识的血肉之躯。他们被殴打的原因也变得很复杂,而有些原因与阶级斗争无关。像《古船》中的地主“瓜儿”,被赵多多用一根绑生猪皮的藤条活活打死,原因是他有个漂亮的女儿,两年前,赵多多曾翻墙入宅试图强奸,但被“瓜儿”当场抓住,遭到一顿训斥。《丰乳肥臀》中的瞎子徐半仙为了给被枪毙的地主张德成(他的姨表兄)报仇,谎称逃跑的地主司马库欠他两条人命,要求与司马库有亲戚关系的土改干部鲁立人枪毙司马库的孩子,导致两个幼小女孩被处死,酿成一出惨剧。这些四五十年代作家有意遮蔽的事实,到新时期作家笔下得到了具体呈现。它使我们看到,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私人欲望向历史事件的渗透,从而彰显了社会进步过程中人性的沉沦与个人命运的无常与无奈。

总的来说,四五十年代作家将土改演绎成为一首欢快、流畅、激越的翻身进行曲,暴力是其中最为高昂的声部;而新时期作家则将土改运动看作是社会进步途中一阵五音杂陈的喧哗,有高昂的政治口号、贪婪者的私语、暴虐者得意的笑声,也有受难者的呻吟,暴力是这几种声音的和鸣。刘小枫在研究叙事伦理时将这两类叙事概括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与“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他解释说:“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迹或经历的人生变故。”<sup>②</sup>土改小说也经历了从“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到“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转换,表征着文学对土改事件的一次成功改写,它唤醒了亲历者被阉割的记忆,也使后人看到了历史的另一幅面孔。历史也只有在文学的一次次回顾中,慢慢露出它的本相,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 二、工作组与贫雇农会

土改工作组一般是由文化人组成,他们在接受了土改政策的培训之后,被派往农村,与当地农会一起领导民众开展土改运动。他们对土改政策的理解和他们个人的品行,直接决定着土改运动的一些基本细节,当然也决定着他们个人在土改中的命运。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作家和新时期作家,在描写这两个权力机构的作用时,表现出了明显差异,对此进行比较分析,对我们认识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时代之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四五十年代作家笔下,土改工作组成员全是“单面人”:他们如同政治符号,缺乏私人生活的必要印记。作为一群外来者,他们与进驻的农村没有任何情感和利益上的瓜葛。在土改过程中,他们也没有丝毫的个人利益的考虑,像一台机器一样,在土改工作中按照设定的程序来运转。他们说的很多话,都来自政策和文件,他们要表达的思想,也与土改运动的要求相一致。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看,工作组成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缺陷的人物,如萧祥、章品等,情感纤尘不染,思想从不超

① 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256页。

②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页。

出政治的框范,性格像一张薄薄的白纸。一类是有缺陷的人物。例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文采,不切实际,夸夸其谈,破绽百出地卖弄学问。在给农民开会时,他一口气讲了6个小时,使听众昏昏欲睡。这是作者对当时知识分子政策的积极回应。在《暴风骤雨》中,小知识分子刘胜也是一个需要改造的典型。他在发动群众受挫之后,就想离开农村,被有经验的萧祥挽留下来。作者还借萧祥的嘴,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番评价:“他碰到过好些他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有一颗好心,但容易冲动,也容易悲观,他们只能打胜仗,不能受挫折,受一丁点儿挫折,就要闹情绪,发生种种不好的倾向。”<sup>①</sup>那种洞察一切、居高临下的语调,从个别现象中发现普遍性的思维方式,是典型“政策附体”的产物。不难看出,“土改干部”身上的缺陷,不是来自个体的生存体验,而是来自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而且他们的“问题”,多发生在工作方法层面上,与个人的品行和觉悟无关。所以尽管作者写出了人物的“缺陷”,也不具有个体性和特殊性。他们和那些没有缺陷的人物一样,是土改干部类型化的标本,缺乏生命活体的基本特征。

这一时期的土改小说对农会的描写也流于概念化,其中的人物也都缺乏鲜明的性格特征。与知识分子被认为具有动摇性和软弱性不同,农民一向被认为是最革命的阶级,所以在描写农会时,重点展示农会成员的优秀品质。《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郭全海是农民优秀品质的化身。周立波对此说得很清楚:“工农兵中间的英雄人物,都是聪明能干、正直无私、勇于负责、坚定不移、不怕牺牲的,都是体现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道德的精华,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纯洁、优美和强韧的英雄人物。”<sup>②</sup>相反,曾经出身地主的张富英,即使进入农会,也无法改变他的阶级本性,最后自然被清理出农会队伍。相比之下,丁玲对农会的描写要高超一些。她笔下的张裕民曾经染有流氓气,程仁因为爱上了钱文贵的侄女而心生苦恼,张正典由于娶了钱文贵的女儿,所以他的革命性经常受到群众的怀疑。这些描写呈现了乡土中国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这对塑造人物是有好处的。但丁玲在创作过程中难以放开手脚,她不断地将自己的小说与土改政策进行对照、审查,所以当提及张裕民“一个短时间染有流氓习气”之后,马上补充一句:“这是一个雇工出身诚实可靠而能干的干部。”<sup>③</sup>小说接下来完全按照后一句展开,张裕民的流氓习气被彻底掩饰起来。在程仁与黑妮的爱情上,作者一再强调黑妮的贫苦出身及其与钱文贵一家人的不合,以显示黑妮还是“自己人”,这样她与程仁的爱情就合乎阶级性的要求了。张正典由于无法改变与钱文贵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么他的消极、自私、贪图享受,就显得渊源有自。所以丁玲在写农会干部的时候,自己仅有的一点思考很快就被自己否定了,小说情节仍然在政治许可的范围内展开,人物关系在稍显复杂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平滑的政治轨道。

在工作组与农会的关系上,这时期的土改小说重点强调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用萧祥嘱咐郭全海的话来说:“你记住一句:破封建,斗地主,只管放手,整出啥事,有我撑腰。”<sup>④</sup>代表上级的工作组成为农会进行土改的靠山,并在政策和方法上提供支持和指导。所以这二者的关系是很单一的政治合作关系,即使偶有分歧,也是在政策层面上展开的,不会涉及到私人利益等更为复杂的层面。所以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被清洗过一样,简单、纯净,这无疑掩盖了土改过程中极为复杂的历史真相。

到了新时期,当年年轻一代作家重返土改这段历史的时候,工作组 members 的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概括起来可分为三种类型:冷漠型、反思型和悲情型。而这三种类型的土改干部也决定了工作组与农会(基层组织)的关系表现为三种形态:合作一致、貌合神离、相互对立。

冷漠型。这类工作组 members 被描写得十分冷漠、冷酷,缺乏同情与温情,心里只有阶级斗争,失掉了萧祥、章品身上那种和蔼可亲的一面。在莫言的《丰乳肥臀》中,土改干部张京被称为“大人物”。

① 周立波:《暴风骤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79页。

② 周立波:《谈思想感情的变化》,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2页。

③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页。

④ 周立波:《暴风骤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232页。

他的出场即非同凡响：“一乘双人小轿，抬来了一个大人物，十八个背着长短枪的士兵护卫着他。鲁县长见了，就像学生见了老师一样恭敬。据说，这个人是有名望的土改专家，曾经在淮北地区提出过‘打死一个富农，胜过打死一只野兔’的口号。”<sup>①</sup>在批斗大会上，这个“大人物”的讲话散发着死亡的气息，作者写到：“大人物清清嗓子，慢条斯理地，把每个字都抻得很长。他的话像长长的纸条在阴凉的东北风中飞舞着。几十年当中，每当我看到那写满种种咒语、挂在死者灵前用白纸剪成的招魂幡时，便想起大人物的那次讲话。”<sup>②</sup>“大人物”讲完话之后，再很少说话，“冷静得像一块黑石头”，他用眼神、动作和简短的语言控制着整个斗争会，决定着被批斗者的生死。当徐半仙为了报复鲁立人提出要枪毙地主司马库的三个孩子时，作为县长的鲁立人犹豫了，他认为孩子是无辜的。但大人物冷漠的表情和简短的话语，逼得鲁立人没有退路，他只好含泪宣布判处司马库的孩子死刑，并解释说：“我们枪毙的看起来是两个孩子，其实不是孩子，我们枪毙的是一种反动落后的社会制度，枪毙的是两个符号！……”<sup>③</sup>司马库的儿子司马粮跑了，他的两个女儿被带往池塘边执行死刑。由于很多人的阻挠和“大姐”脱衣相救，枪毙没有马上执行，就在这时富有传奇和诗意的一幕出现了：两个骑手策马而来，以优美、洒脱的动作各开一枪，飘然而去。等他们走了之后，人们惊讶地看到司马库的孪生女儿脑袋上各中一枪，子弹从她们的额头正中钻进去，从后脑勺上钻出来，位置不差分毫，令人叹为观止。这显然是“大人物”的杰作，他以诗意飞扬的方式处决了两个未谙世事的孩子。作者运用传奇笔法和赞赏的语调，表达了对“大人物”的嘲讽。同样的土改干部也出现在尤凤伟笔下。《1948》“土篇”中的侯队长，平常为人显得很和蔼，但他满肚子是政策。在斗争地主的时候，也表现出了冷酷的一面。地主田宝安已献出了所有财产，但他的左手上有一枚金戒指，是小时候戴上的，已经撸不下来了。侯队长十分生气，咬着牙说：“妈拉个巴子连根指头都斗不过还斗什么国民党反动派！现在我声明，这个戒指不交公了，换钱买牛，谁把戒指弄下来牛就归谁。”<sup>④</sup>这时一群农民抢着上去撸戒指，疼得田宝安嗷嗷大叫，但没有成功；另一个农民干脆用斧头剁掉了田宝安的手指，取走了戒指。在这个过程中，侯队长面对着田宝安的苦苦哀求，无动于衷。田宝安被剁掉手指后，他的厄运并没有结束。侯队长说他是国民党特务，由不得田宝安辩解，一群“革命群众”就上台对田宝安进行殴打。最后在侯队长说了一个“斩”字时，田宝安的头被人用铁锹劈开，脑花四溅。接近侯队长的人说，侯队长有说“斩”的口头语，那天他说“斩”，不知是真的想“斩”田宝安，还是说了个口头语。但无论如何，他都认为杀死田宝安是土改斗争的“又一个胜利”。他总结说：“反动派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革命群众绝不会心慈手软。”土改中的暴力现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暴力事件的发生，都与这类土改干部有关。正是他们的冷漠和对阶级斗争的简单化理解，酿成了诸多悲剧。由于这类干部颐指气使，所以农会干部基本没有说话的份儿，只能是言听计从。在一般情况下，农会干部比工作组的干部要激烈得多，在分浮财、挖底财、凌虐地主方面，比工作组的积极性更高。但当工作组变得比农民还要激烈的时候，农民就不会对他们有意见了。所以在这类描写中，工作组和农会往往配合得很默契，合作得很愉快。

反思型。这类工作组成员有很强的原则性，严格遵守土改文件中规定的保护富农、中农和开明绅士利益的有关条款，反对乱打乱杀，从不迁就民众自发的暴力倾向。对农会干部中的草菅人命之辈，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有时还会间接地保护地主的生命。同时，他们对正在进行的运动，常常进行深刻的反思。《古船》中的王书记就是一个清醒、理智的人。当一个老汉用镰刀从地主“面脸”的脸上挖下一块肉，回家给儿子熬药时，“王书记拍案而起，吼了一声什么冲下台来”，他显然无法忍受此等暴虐行径。农会干部栾大胡子对王书记的行为很不满，他对王书记嚷道：“今天就吃他‘面脸’的

① 莫言：《丰乳肥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39页。

② 莫言：《丰乳肥臀》，第241页。

③ 莫言：《丰乳肥臀》，第249页。

④ 尤凤伟：《1948》，《西部》2008年第8期。



肉！怎么着？你护着谁？”王书记大声说：“我护着上级政策！我们是八路军共产党，不是土匪！你也是共产党员，你知道杀一个人要经‘巡回法庭’！”在劝阻群众时，他的肩膀受了伤。为了阻止暴行的蔓延，他忍着伤痛从县上带回了“巡回法庭”，要求按法律程序处理地主和富农。面对着暴怒的群众，他说：“要打倒就把我打倒吧。我已经挨了一刀，再打倒也容易。不过我在这儿一天，就不准乱打乱杀。谁借机杀人，破坏土改，我就先把谁抓起来！……”。面对赵多多的肆意妄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发动的是群众的阶级觉悟，不是发动一部分人的兽性！”<sup>①</sup>这可谓是智者之见，但能意识到这一点的土改干部实在太少。尤凤伟笔下的土改干部易远方，对民兵队长李恩宽厌恶至极，称他是流氓、无赖，他把自己与李恩宽之间的较量，看作是“人格的较量”。当李恩宽威胁他时，他对李恩宽说：“你是个品行恶劣的家伙，你把革命和邪恶连在一起，你在打击坏人的时候自己也变成了坏人。你强奸李朵不成，便诬告她勾引你，伤天害理；你不会知道，要不是李朵搭救，今晚你必死无疑。”<sup>②</sup>更让易远方困惑的是贫协主席申富贵。申富贵曾经是个地主，土改前三年，还有几十亩好地，一匹马，一挂大车，常年雇着一个长工，娶了个年轻美貌的老婆。但他这位年轻漂亮的老婆与村里一个小伙子通奸。他发现后告到村长李裕川那里，早就觊觎他财产的李裕川将一对偷情男女吊打之后，各罚10块银元。老婆没有私房钱，申富贵只好替老婆缴纳罚款。以后他再发现老婆偷情，也不敢告发了。但李裕川仍积极捉奸，捉到便吊打、罚款。结果不到两年功夫，申富贵破产了，老婆也跟人跑掉了。申富贵由此恨上了李裕川。土改开始之后，申富贵成为贫农，斗争地主李裕川时十分积极，就成为贫协主席。面对着如此有戏剧性的事件，易远方在苦苦思索：“该如何看待申富贵几乎是一夜间的兴衰与阶级变迁？财产与人的本性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作为一个对农村状况所知不多的土改工作队队长，他确实感到迷茫。”<sup>③</sup>一个工作组的成员思考这类问题，这是四五十年代的作家无论如何也不敢涉及的。由于这些工作组人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们对农会干部的暴力行为和人格常常产生怀疑，导致了他们与农会之间的貌合神离。用王留花的话来说：“你们工作组和俺们贫雇农不一条心，卜队长搞地主女人，你包庇地主女人，俺去区土改工作团告你！”但是也必须看到，工作组人员的反思是有限度的。在当时的背景下，他们不可能对正在进行的运动进行总体性反思和评价，只是在实际工作中发表了个人的一些感想、疑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赋予的一种精神力量。

悲情型。这类人物在土改过程中，不再仅仅是站在局外的指导者，而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所在乡村的土改运动紧紧搅和在了一起，酿成人生悲剧。《古船》中洼狸镇的土改基本结束后，村里发起了动员年轻人参军的热潮。新入党的赵炳在动员大会上“慷慨陈词，晓之以理。台下口号不断，热泪滚滚”。一批一批的人送走了，镇上几乎见不到昂首挺胸的小伙子了。这时“镇上的指导员”也劝赵炳到部队上去，赵炳表面上欣然接受，实则怀恨在心，便指使赵多多诬陷指导员通敌。结果“一个星期以后，上边来人了。指导员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给绑起来了。接着往县上送。赵多多领着民兵送了一程又一程，路上对指导员说：‘我的话这回信了？我们还没有走你都给抓了；若是走了，还不就干掉了？’指导员咯咯地咬着牙齿，一声不吭。”<sup>④</sup>因为自己多说了一句话，得罪了赵炳，就导致这样一种下场，反映了土改干部和基层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尤凤伟笔下。到李家庄领导土改的工作组组长卜正举，因为同情地主家的儿媳妇小婉，遂产生了爱情。此事被民兵队长李恩宽告发，卜被撤职，发回原籍；小婉成为勾引土改干部的罪人，未等批斗大会召开就先吓疯了。但有一天，卜重新回到李家庄，找到他的继任易远方，要求与小婉见面，唤回她的记忆，并希望为小婉洗刷清白。他痛苦地申诉：“小婉没做妨碍土改的事，更没破坏土改，她希望土改成功自己得到解放

① 上述情节与引文，均见张炜《古船》第18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56-274页。

② 尤凤伟：《1948》，《西部》2008年第8期。

③ 尤凤伟：《1948》，《西部》2008年第8期。

④ 张炜：《古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68页。

……可她没等到那一天就疯了,是我害了她,我不能丢下她不管。我听说精神错乱的人见到当初给她造成刺激的人就能恢复神志,所以我要见她,想办法让她恢复神志。就是好不了,我也不抛弃她,我要求把她带走,一起回我的长丰老家,我会好好待她,伺候她一辈子……”<sup>①</sup>小婉其实是一个苦命人,家里穷,嫁给地主赵祖辉的儿子后,经常被赵祖辉糟蹋,不从就往死里打。她盼望着解放,向往摆脱赵家的折磨。但正是在解放运动到来的时候,她被吓疯了。为了不让她在街上说一些近于下流的疯言疯语,农会干部王留花用针扎她的乳房;在与地主武装对峙的时候,她的婆婆为了暴露目标,用针扎她。卜正举为了阻止小婉叫喊,用手捂住她的嘴,结果将她闷死了。卜正举悲痛欲绝,最后带着小婉的尸体走了。卜正举违背了“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不讲仁义”的阶级斗争原则,更不该对地主家的女人抱有同情和爱情,那是一个不适于爱和同情的年代。正如《1948》“土篇”中土改干部说的那样:“我们革命人认为,只有革命事业才会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包括生命。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爱情值什么?”<sup>②</sup>的确,在宏大的革命面前,个人的生命都变得微如草芥,遑论爱情?

卜队长的继任易远方,在李家庄整个土改过程中,心情都是沉重的。在他尚未进村时,就看到了一条红红的“血河”,他惊恐地跑过去,发现河水中漂满了桃花,河边一位少女在捞花瓣,吟唱着《五月的鲜花》。他一下子对这位女孩产生了好感,但当他进村之后才知道,这位女孩是大地主李裕川的女儿李朵。很快李朵成为被批斗的对象,易远方心中充满了同情和怜惜,总是禁不住要保护她,时常劝她离开村子。但这位纯洁的少女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她得知她的父亲要带人回村洗劫时,她为了保住村子,就将消息告诉了易远方,并要求易远方答应放走她的父亲。但她这种美好的愿望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注定是无法实现的,她最后在枪战中死去。易远方怀着沉痛的心情把她埋葬在“血河”边上。在这类描写中,我们看到工作组与农会干部之间深深的隔阂和本质上的差异、对立,反映了这两个权力机构在土改工作中的不和谐,它在本质上是文明与野蛮、暴力与人性之间的对峙。

### 三、土改小说与左翼文学传统

两个时代土改小说在艺术成就上的差异是明显的,但它们的历史地位又是无法取代的,它们各自承担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今天,反思四五十年代土改小说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除了看到时代政治对文学的规约和作家们的“正史”<sup>③</sup>心态对创作的规制以外,还必须看到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左翼文学传统对土改小说的影响。左翼文学产生于1920年代,繁荣于红色1930年代的前期。当时国共两党已变得冰炭难容、不共戴天,阶级斗争成为时代政治的主旋律。在两党对垒的政治环境下,广大的农村也被纳入到阶级斗争的框架之中,占有土地的地主被认定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同盟与帮凶,需要代替他们的“主子”偿还血债、接受惩罚,而广大的贫雇农成为革命的力量,代表着正义和进步,向地主讨还血债;源于政党对垒的阶级怨恨和略显抽象的阶级斗争观念,具体化成了农民向地主的复仇行动。以配合政治斗争为己任的左翼文学,也就自觉地承担了反映、演绎和诠释阶级斗争的使命。蒋光慈是最典型的代表。早在1926年,他在《少年漂泊者》中就表达了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和农民渴望复仇的要求。小说中的少年汪中,在父母被地主逼死之后,恍然进入梦境,举刀向地主复仇:“……我的灵魂似觉已离开我原有的坐处。模模糊糊地我跑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径自出了家门,向着刘家老楼行去。……我走向前向刘老太爷劈头一菜刀,将他头劈为两半,他的血即刻把我的两手染红了,并流了满地,满桌子,满酒杯里。他从椅子上倒下地来了,两手继续地乱抓;一班贵客都惊慌失色地跑了,有的竟吓得晕倒在地上。”<sup>④</sup>但当时中共力量相对

① 尤凤伟:《1948》,《西部》2008年第8期。

② 尤凤伟:《1948》,《西部》2008年第8期。

③ 以写“正史”的心理进行小说创作,是1940年代土改小说家的普遍心态,这对作品的取材和思想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④ 蒋光慈:《少年漂泊者》,《蒋光慈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6页。

弱小,尚未发动土地革命,所以汪中的复仇愿望无法得到满足,只能远走他乡,寻找报仇的机会。而他的《咆哮了的土地》写于中共领导土地革命的时期,像汪中这样受地主压迫的农民终于等来了复仇的机会。他们在张进德、李杰的带领下,斗争土豪劣绅,火烧地主宅院(包括李杰家的李家老楼),建立根据地等等,农民终于找到了带领他们复仇的领路人。作为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咆哮了的土地》对此后的阶级斗争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咆哮了的土地》“第一次以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正面触及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根本性质——农业国情与农民战争的现实问题”<sup>①</sup>,“成为了中国‘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源头与仿效范本——纵观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无论是其故事叙事或情节结构,还是其主题思想或人物形象,我们都能从中发现其与《咆哮了的土地》之间‘似曾相识’的血缘关系”<sup>②</sup>。丁玲和周立波等很多土改小说家,都曾是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健将,也曾深受蒋光慈的影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情节的设置到场景的描写,“都深深地烙有《咆哮了的土地》的鲜明印记”<sup>③</sup>。事实上,自1920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开始,中国文学的阶级斗争模式已经形成,它经过1930年代的发育、1940年代解放区的成长,到1950年代便统领了整个文坛。它的基本特征是:人物阶级化、情节斗争化、矛盾尖锐化、结局喜剧化,正应了那几句偈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敌人是狡猾的,不打是不死的。丁玲等人的土改小说,只是这一创作模式的一个阶段,与此前此后的阶级斗争文学是血脉贯通的。有人将这一模式称为“农民+革命”,以便使之与“革命+恋爱”相呼应,这不无道理。但深入一点来说,这类作品背后潜藏着更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心理动因,我们称之为革命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这是左翼文学最为核心的精神基底。革命者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出发构建未来理想的社会,那是一个所有被压迫者都能够得到平等和幸福的社会,所以这一理想不仅是美好的,也是崇高的、神圣的。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就需要彻底消灭所有的敌对力量,所谓“目的决定手段”——只要目的崇高,任何手段都是正义的,都是被允许的。从1930年代描写土地革命的左翼文学,到1940年代的土改小说,都流灌着这样一种理念。同时,越是美好的理想,越需要精心守护,所以它往往给信仰者带来“精神洁癖”症,会让人以极端的方式排斥“不洁之物”,甚至对自身也要进行不断清洗,这是使革命走向极端的内在驱动力。在土改小说背后,也有着这样一种精神底色。所以,四五十年代的土改小说,是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传统的延续,它们在精神上是完全相通的。八九十年代的土改小说,以新时期以来的新启蒙文学为思想依托,完全走出了左翼文学的场域,所以在创作上就获得了崭新的视野和相对自主的观念。

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从外部强行植入乡土中国的政治运动,旨在改变中国数千年来的经济制度。它借助权力和暴力,以一种极为刚性的方式,推动历史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它有意屏蔽了一些基本问题:如“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财富与人的品行是否有着绝对的对对应关系?”“数千年的社会不公,是否该由富人来承担?”“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否像战场上的两军对阵一样壁垒分明?”“将战争思维运用于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是否适当?”这些问题被简单化之后,一部分人的悲剧命运就在所难免:就像狂风荡涤尘埃,也会毁掉良木一样。文学就应该在历史进步主义的缝隙中寻找个体的命运,尤其是那些弱小者、弱势者的命运。但在政治运动正在进行的时候,作家们响应时代的召唤,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时代的政治变革中去,文学成为时代变革的鼓吹者和宣传者,这是可以理解的,其作品也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但当政治变革已成历史,后人省察历史的时候,文学对生命的关爱就变得更为强大,其意义也更为深远。两个时期土改小说创作的不同形态,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 贺立华]

① 宋剑华:《生命阅读与神话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文本的重新释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5页。

② 宋剑华:《生命阅读与神话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文本的重新释义》,第104-105页。

③ 宋剑华:《生命阅读与神话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文本的重新释义》,第113页。